

以翻译助力“侨乡文化话语建构”的研究路径分析

——以惠州为例

沈立柱¹ 郑文文²

(1.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2.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侨乡文化的话语建构是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一部分,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地方性智慧。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从未像现在这样积极地参与到公共叙事中, 本文通过解读翻译对侨乡文化话语建构的作用, 确定宏观架构下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设计采用个案研究与定性分析方法, 以便更好地形成整体性、创新性的研究架构, 进而为侨乡文化话语构建的深层次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关键词:

“话语建构”是当今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高频术语之一。提到“话语”, 人们往往将其与“权力”这一意识形态术语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福柯对隐匿于话语背后的社会权力的深刻揭示及其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断。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是以相应的知识生产为前提和基础的, 权力产生于特定的知识场域, 并借助话语体系来实现转换和建构。就知识、话语与权力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而论, 话语是连接知识和权力的重要媒介, 是促成知识最终向权力转化的外化工具(Foucault, 1999)。不难发现, 三者的关系的相互交织作用, 其中, 话语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尤为紧密。从该意义上讲, 人类话语实践的本质是知识实践, 知识在实践场域中借助话语进行传播。

侨乡文化话语的国际传播本质上即是“地方性知识”的国际传播。侨乡文化话语建构是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话语体系建构的一部分。海外华人的故乡或祖籍地被中国人称为“侨乡”地区,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产物。在对其多种定义进行研究后, 熊燕军等人指出, “侨乡”概念的重点已经从“经济优先”转向“文化主导”, 也就是说, 侨乡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多地见于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诚然, 侨乡地区因海外经济元素(主要是海外汇款和投资)而与众不同, 而更重要的是, 它们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景观, 在建筑、语言、服装、习俗、行为甚至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方面都具有显著特征。

在海外华人的支持下, 随着经济的发展, 侨乡地区基于其特殊的现实情况, 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其文化建设的驱动力。侨乡文化话语建构是国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推动着国际交流的形式多样化与内容多元化, 以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促进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不断更新并保持新鲜活力。惠州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二线城市, 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之一, 旅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数量居客家四州之首, 素有“客家侨都”之称。惠州的主要交流语言是客家话、白话(粤语)、福佬话(闽语)和普通话, 因此必须借助于翻译来进行国际文化传播。

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从未像现在这样积极地参与到公共叙事。公共叙事与本体论叙事不同, 是指由社会组织讲述的故事, 包括家庭单位、社会媒体和国家。在神学上, 公共叙事属于社会学。从社会学到翻译研究, 叙事理论是由 Baker 在 2006 年首次提出的。她把翻译放在社会背景中, 指出如果没有笔译员和口译员的参与, 叙事就无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因此, 可以看出, 对于侨乡

地区的可视化, 翻译在相应的公共叙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译员和口译员也应对此肩负重要责任。在侨乡地区的文化话语建设中, “翻译”在此语境下对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的影响、相应信息可视化的实现路径以及对目前现状的改进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受到关注并加以深入探讨。

一、研究意义

本研究试图从社会叙事理论和话语修辞学的角度, 探讨通过“翻译”进行侨乡地区的文化话语建设。在当前这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 总结凝练的地方性智慧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提升‘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力, 为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普适性的价值参考, 是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体现, 也需要相关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有效传播”(魏向清等, 2019)。侨乡地区的文化话语建构被认为是中国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因此, 就理论意义而言, 对翻译助力侨乡地区文化话语建构路径的探索可以拓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内涵和外延, 丰富“地方性知识”概念和“话语建构”理论, 助力翻译与国际文化传播的宏观和微观语境研究。就应用价值而言, 侨乡地区的文化话语建构过程中的翻译研究, 不仅有利于加速中国对外传播的翻译标准化进程, 而且有利于侨乡地区地方性知识向世界的表达和阐释, 使其传递的地方智慧有可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 此举无疑是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提供一个地方性的有效方案。

二、研究目标

(一) 探讨惠州侨乡地区文化话语建设的现状。

(二) 分析翻译在话语建设中的影响, 基于不同视角: 笔译和口译的修辞话语; 国际传播和接受度。

(三) 基于翻译为侨乡文化话语建构提出可行的建设性建议。

三、研究问题

(一) 翻译对侨乡地区国际传播中话语建构有哪些影响? 如何进行科学评价?

(二) 案例城市惠州目前的翻译现状是什么? 翻译覆盖面如何? 翻译语言质量如何? 具体受众有哪些以及接受度如何? 它能促进国际沟通并获得正反馈吗?

(三) 如何进一步改进或加强涉及侨乡文化的翻译现状? 是否可以尝试组织翻译社群和建立国际传播的人才库等途径?

四、问题陈述

侨乡地区是华侨华人的故乡, 是中国社会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历史见证了家族群体、华侨华人个体和产业集群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而形成了生态平衡的区域文化。到目前为止, 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人的移民历史、海外华人个体, 以及包括遗产旅游在内的侨乡地区的保护和发展, 横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 and 心理学等不同学科。

然而, 很少有研究强调侨乡地区的文化话语建设。以惠州为例, 它是广东省与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的重要窗口; 广大华侨华人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非常关注祖国的国

际形象，一直热衷于公共外交，在世界各地充当“民间外交官”。在移居海外较长时间后，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及其年轻一代受到居住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同化，很可能会对侨乡地区的后续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具有侨乡特色的文化话语被认为是侨乡地区长期发展的需要。博物馆、剧院、自然和文化遗产以及企业和工业文化的特殊话语，将使侨乡地区对内促进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对外则反映他们对当地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和物质文化的发展，遵循中国所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此外，对于案例城市惠州来说，目前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海上贸易通道等宏观视野下讨论具体的翻译质量、翻译教学或译员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惠州作为广东省著名华侨之乡，早在唐代，惠州就有居民开始向东南亚移民，如今惠州市籍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五大洲，据惠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21 年统计数据，惠州市共有归侨 1.2 万人、侨眷 80 万人，海外惠州籍侨胞约 300 万人，海外侨胞主要分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越南、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其海外商业经营范围也不停留于餐馆、商场，而扩展到房地产、旅行社、金融、时装、电讯器材、工艺美术、印刷出版等各行各业，因此其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传播话语具有重要意义。对该语境下话语建构的研究不足，尤其是通过翻译方式的话语建构，显然是一块有待填补的空白。这类地区的全球话语建构是如何基于侨乡实际而实现的？具体来说，侨乡文化话语或叙事对于当今全球化世界的文化话语建构是否有效或有所帮助？在文化话语的建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五、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个案研究，将课题缩小到一个可行的、可评估的范围内。如上所述，惠州是研究侨乡地区文化话语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惠州的历史文化颇具特色，而且与海外华人在各个领域的建树有很大的关联性。通过该地区侨乡文化话语建构中的翻译角色研究，以小窥大、以点带面。

其次，将从话语修辞和社会叙事理论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评估翻译质量。材料包括惠州侨文化博物馆的中英文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推广相关的工业展览以及政府机构制作的宣传片。

再次，通过文献研究方法，详细考察《惠州华侨志》《南洋华侨通史》等研究著作和惠州市侨联网站、马六甲广东会馆网站等网络资源，针对性地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惠州侨胞人物所发挥的国内、国际文化影响力和话语建设作用，着重考察翻译在其间所承担的重要作用。

最后，在调查问卷的同时，还将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惠州的接待人员和翻译人员、海外华人中年轻一代游客，以及在惠州生活或访问的外国游客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入访谈。受访者总数设计不少于 40 人。此外，在有外国游客与口译员同行的情况下，将采用实地调查：现场观察口译员的服务质量、游客的反应和接受程度，从而总结出笔译和口译中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文化和再认知差异的实际问题。在分析方法上，可以应用 SPSS 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定性材料分析与主题分析。

六、文献综述

哈里斯在 1952 年首次提出“话语分析”的概念，将“话语”置于分析的背景中。从随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话语分析被置入各个学科的探讨之中。福柯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话语理论：话语是权力的工具。福柯认为，话语的陈述主体是由话语和休息话语系统建构和支配的，它的作用和属性是由话语定义的。按照 Weedon 的解释，话语指的是“构成知识的方式，以及社会实践、

主体性的形式和权力关系，这些都存在于这种知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话语不仅仅是思考和产生意义的方式。它们构成了它们试图支配的主体的身体、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头脑以及情感生活的‘特质’”。在此基础上，Bourdieu 提出了语言的象征力量，认为话语是社会性的，代表了话语主体的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荷兰新闻学者 Van Dijk 指出，话语实际上是“社会互动”。这些都表明了话语的动态建构主义，它成为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个人通过话语的建构、选择和解构行使权力。简而言之，话语围绕着特定的命题进行陈述，由不同的话语主体连接成有意义的、系统的交流内容。

“从传统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实现意义传播的媒介主要有两种形式：由声波传导的声乐符号和由笔产生的书面符号，它们是语言传播的主要媒介”（吕健等，2012）。声乐和书面语言都是话语。正如陈小慰所指出的，主要基于使用目标语言来影响受众，促使他们改变态度或采取行动的一种话语模式，现实世界中的翻译活动都是修辞行为。因此，话语修辞也是翻译中的一个常态化概念。对于文化话语的建构，语言的呈现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层面，我们要追求的是使翻译的成果能够有效地影响受众，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要求译员或口译员有足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必须有足够的受众意识（陈小慰，2013）。修辞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的角色认同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复杂的角色认同构成了复杂的主体间关系，在具体的修辞活动中进一步分化（谭学纯等，2008）。正如陈小慰所进一步阐述的，在更深的意义上，修辞是一种修辞策略，其目的在于实现敦促受众改变其原有的观点、态度或行为，并按照修辞者的意愿行事的基本任务。因此，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包括重视他们的情感、认知、信仰、好恶、价值取向等）决定说什么和怎么说，是修辞者修辞操作的集中体现（刘亚猛，2004）。

此外，社会叙事理论是 Baker 在其《翻译与冲突》一书中提出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它结合了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的叙事理论，将翻译行为阐述为一种叙事行为，对国际政治话语的构建和国际传播而言尤为如此。显然，该理论符合对于翻译在侨乡文化话语建构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需要，为本次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应注意该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过度关注政治事件，较少强调翻译的动机和效果，而这恰恰是国际话语体系建构语境下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次研究在侨乡文化话语建构的微观视域下对于翻译的社会叙事进行了理论的延展与探索。

参考文献：

- [1] 熊燕军、陈雍. 从“经济侨乡”到“文化侨乡”：侨乡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 [J]. 华侨大学学报, 2018 (04) 39-47.
- [2] 郭平兴、王琛发. 马来西亚惠州人、惠州会馆与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 [J]. 地方文化研究, 2018 (06) 95-103.
- [3] 魏向清、杨平.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与术语翻译标准化 [J]. 中国翻译, 2019, 40 (01) 91-97.
- [4] 陈小慰. 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 [J]. 中国翻译, 2013, 34 (02) 95-100.
- [5] 吕健、吴文智. 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影片《金陵十三钗》的字幕翻译研究 [J]. 上海翻译, 2012 (4) : 36-38.

作者简介：

沈立柱，男，广州工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传播，商务英语教学；
郑文文，女，青岛滨海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法。